

【 中国近现代
高等教育研究
丛书 】



周川◎主编

民国教育部与 高校关系之研究

(1912~1937)

崔恒秀◎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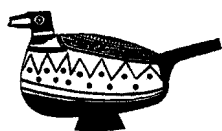
MINGUO JIAOYUBU YU
GAOXIAO GUANXI ZHI YANJIU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周川◎主编



民国教育部与 高校关系之研究

(1912~1937)

崔恒秀◎著

MINGUO JIAOYUBU YU
GAOXIAO GUANXI ZHI YANJIU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教育部与大学关系之研究：1912~1937/崔恒秀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7
(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研究丛书/周川主编)
ISBN 978-7-5334-5584-2

I. ①民… II. ①崔… III. ①国民政府—教育部—关系—大学—教育史—研究—中国—1912~1937 IV. ①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2582 号

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研究丛书

民国教育部与大学关系之研究 (1912~1937)

周 川 主编

崔恒秀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01 电话：0591—83706771

83733693 传真：83726980 网址：www.fep.com.cn)

印 刷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福州铜盘路 278 号 邮编：350003)

开 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3

插 页 2

字 数 237 千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5584-2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向本社出版科（电话：0591—83726019）调换。

序

周 川

一

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始于 19 世纪中后期，下限大约在 20 世纪中叶，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

这一个世纪，是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的时期。“半封建”与“半资本主义”、“半殖民地”与“半独立”、新与旧、中与西、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动，这些对立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构成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社会大环境，决定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在重大社会转折期特有的矛盾，也决定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特殊的发展道路。一方面，是近现代高等教育登峰造极的种种矛盾和乱象，例如旧北京的“八大胡同两院一堂”，此起彼伏的校长风潮、校名风潮、索薪风潮、“脱部”风潮，当然还有军阀政客对高等教育的恣意摧残和蹂躏等等。另一方面，也正因为环境的艰险，反而映衬出近现代高等教育所取得的任何一点进步和成就，更显得来之不易；筚路蓝缕的先驱者们为当时中国高等教育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更显得不同凡响。例如，为了维护大学自治和自由，儒雅的北大校长蔡元培面对北洋政府的淫威，挺身而出向全社会宣言：“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又如抗战期间，许多大学颠沛流离，师生饥寒交迫。西南联大像梅贻琦、闻一多那样的名校长、名教授也不得不靠售卖太太的女红或是代人刻章以维持生计。然而，在那样的艰难困苦之中，师生们却

“同艰难、尽笳吹”，修业乐道，弦歌不辍。难怪李约瑟盛赞，那些为避战火而迁徙到深山里的大学，简直就是“东方的剑桥”。在李约瑟看来，如此艰难环境中办出如此成就的大学，不啻教育的奇迹！总之，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就是在这矛盾的两极之间艰难地孕育和发展。在那里，我们既能看到忠君尊孔和“党化教育”方针，又能看到“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术纲领；既能看到战火延绵、政局动荡而造成的乱象，也能看到应规蹈矩、循序渐进的井然秩序；既能看到“封建、买办、法西斯教育”的阴影，又能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看到科学、民主、自由力量的生长和种种教育奇迹的涌现。

环境动荡艰险，道路曲折坎坷，内容丰富多彩，成败泾渭分明；这就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为后人留下的一笔独特的历史遗产。这笔历史遗产，无论是“教育的奇迹”还是乱世的牺牲，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它都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有意义的典型案例，也是中国近现代特殊社会性状的真实缩影。然而，对这笔历史的遗产，我们显然尚未给予应有的重视，也没有认真系统地加以总结，因而对它的本来面目我们还所知甚少。今天，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更多的是那个特殊年代大学内外的种种“故事”和“掌故”，还有许许多多的“奇闻轶事”。故事多，轶闻多，说明了这段历史有丰富的内容，有流传的价值，最起码说明在今天看来还是很新鲜。但是，我们显然不能仅仅停留在“故事”的层面上来继承这笔历史遗产，也不能仅仅以讲故事的心态来对待它。这笔历史遗产的珍贵意义在于，一方面，它构成了一个内容极为丰富并且极具挑战性的研究领域，需要我们用科学的态度和理性的工具去爬梳整理、系统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还原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本来面目，揭示世界高等教育史上这个特殊案例的真谛，以进一步丰富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另一方面，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昨天；不管我们是否正视它，也不管我们如何对待它，它都是历史的存在，都是今日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前进路标，是今人可以对照的一面明镜。因此，对于当下中国高等教育来说，研究这一段历史，总结其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以弘扬优良传统、避免重蹈覆辙，也不失其现实的意义。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以苏州大学“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点和

省级重点学科为依托，组织相关方向的教师和博士研究生，撰著了这套“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研究”丛书。这套丛书肯定无力承担系统总结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历史经验教训这样宏大的主题，它只是选择了这段历史中几个具体的点或线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文献研究的方法，旨在厘清事实，还原真相，描绘路径，透视背景，分析因果，评价功过，论证意义。即便是这样，对于大多侧重于教育学背景的各位著者来说，仍然是一个充满了挑战性的高难度目标。但是，我们坚信“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的古训，坚信了解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对于当下中国高等教育的深远意义，同时我们也坚信：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本着以勤补拙的态度，发扬钻研细微的精神，愿花大力气，肯下笨功夫，我们的这一工作就一定能取得钝学累功的效果，也一定会产生积极的意义。因此，我们敢于不揣浅陋，将这套丛书奉献在所有关心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问题的读者面前。

二

崔恒秀博士所著《民国教育部与大学关系之研究（1912～1937）》，是一部研究民国早期教育部与大学关系问题的专著，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

本书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的整理，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描述了民国教育部的沿革与组织架构，论述了民国教育部对大学的主要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当时部校关系的实际状况及其政治、学术、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客观地评价了民国教育部的作用和局限，总结了民国时期部校关系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为大学与政府关系的理论问题提供了一个翔实而生动的历史案例。

一百年前，民国肇始，教育部取代清学部，成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本书给我们描述的民国教育部与大学的关系，总的来看，是既简单又不简单。“简单”者，教育部对大学的管理职能，主要在制定政策法规、发布训令、拨款、委任校长等方面，教育部手里的资源不多，因而就没有繁多的行政审批项目，也没有复杂的评审程序，减少了制造“复杂性”的可能。即使是那几项比较基本的职能，也常常由于政令不通、令不行禁不

止,在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书中所举的一些实例,如“五四”时期一些大学不顾教育部的成例,开放女禁,实行男女同校;20世纪30年代许多大学无视教育部的规定,对“党义”课敷衍塞责,甚至“向未开班”,诸如此类,教育部除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无计可施,只能徒叹奈何。即使是部校之间发生某些严重的分歧和矛盾,如北京大学评议会表决“脱离教育部”事件、中央大学师生反对段锡朋掌校事件,双方短兵相接,倒也能速战速决。这样的部校关系,好也罢,坏也罢,但确实比较简单,一目了然。原因当然也很清楚,一是民国初起,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政体未稳,根基未牢,加之军阀割据,社会动荡,最高当局号令全国的威权十分有限,何况区区教育部。二是当时的教育部本身也相对简单,部制比较明确,职权比较清晰,部校信息比较对称。其实,在部校关系中,教育部肯定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只要教育部简单,不复杂,部校关系就复杂不到哪里去。另外,民国早期起过重要作用的教育总长、部长们,从蔡元培、范源濂、傅增湘,到蒋梦麟、李书华、朱家骅、王世杰等,多为硕学鸿儒、一代师表,他们“见识不差”,中规中矩。个人的因素,对于处理部校关系肯定也有积极的作用,亦所谓“道高于势”吧!

而“不简单”者,也着实不简单。民国早期,本来就是天翻地覆的年代,社会本身的复杂、动荡,不可避免地会带到政府和大学的关系之中,政治、经济、战争、人际等方面的种种纷争,都势必在部校关系中反映出来,使得部校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复杂、纷乱的一面。四川大学校长王兆荣不满教育部在经费问题上的偏颇,呈文要求增加本校经费未果,不得已请假赴京,终于“跑部钱进”。这种关系多少就有点复杂而且微妙了。20世纪30年代初,蒋介石以党国元首之尊兼任教育部长。这样的先例虽非绝无仅有,但此公的主要意图,是想凭一己之力来平息此起彼伏的学潮,这样的部校关系,就很是复杂了。谁知过了不久,蒋氏还要再兼一个中央大学校长,这无论对于中央大学,还是对于其他高校,部校关系的复杂性便陡然骤升了。1927年试行大学区制的初衷,显然意在进一步简化部校关系,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原先部校关系中盘根错节的派系、经费、人事之争,在“区”校关系上变本加厉地爆发出来,以至于大学区制“出师未捷身先死”,终又回复到部校的老套之中。部校关系的复杂性,剪不断,理

还乱，由此也可见一斑。

本书的特色之一，是以翔实的文献资料为依据，通过对典型史例的梳理、分析，揭示民国早期教育部与大学关系的实际状况及其具体原因，并给予公允的评价，较好地体现了论从史出的原则。这与作者本科、硕士期间所接受的史学训练有密切的关系。历史研究，真实始终是第一位的，这是史学的生命所在，也是它最能与自然科学相通的地方。当然，论从史出，出到什么程度，论到什么层次，也是有讲究的。例如，民国教育部竭力去管的一些事，没能管好；而一些没有管的事，或鞭长莫及的事，大学自己倒也运行得挺好。历史就是这样无情，政府对大学管得越多，管其不应管，往往越是管不好，甚至还有副作用；相反，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对大学什么都别管，效果却常常出乎意料。原因到底何在？又例如，民国教育部虽握有拨款大权，但教育部却不能以拨款来“随意干涉”大学事务，不能按“谁出钱谁点菜”的规则行事，在一定时期内部校之间为此还形成“共识”。又是什么因素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和惯例？再例如，教育部作为中央政府的一个部门，“从属与维护政府的立场和态度不会因人因事而改变”，但是也有例外，如20世纪20年代初“索薪运动”中的北洋教育部，又如“五四运动”中的教育总长傅增湘。对这些例外，如何给出更全面的解释？诸如此类有典型意义的史例，背后大有深意，涉及一系列深层的理论问题。这是需要作者在以后的研究中更深入地加以思考和探究的。

周 川

2011年4月26日

前言

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既是一个古典领域的问题，又是当今高教体制改革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更是高校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1912年至1937年间，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机关与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之间的真实历史关系，鲜有人进行过系统探究。

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收集、阅读、整理、理解和考证相关资料，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论从史出的原则，以教育部对大学的管理职能和管理手段为线索，尽可能翔实地展示1912年到1937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部校关系的历史真实，系统地分析部校关系，并给予公允的评价与臧否；总结民国时期部校关系的有益的历史经验与可借鉴之处，为当今的高等教育提供历史的参考；为大学与政府的复杂关系寻找一个历史的例证，以丰富大学与政府关系的理论。

本书的研究显示，教育部主要通过设立组织机构、制定高等教育政策法规、训令视导、下达咨文、任命校长、学科课程设置管理、师资管理等方式对大学进行管理。

部校之间，并非单纯地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更有互为尊重与合作、不作为与敷衍了事、抵制与冲突等各种复杂形态。部校之间尤其是教育部与国立大学之间关系的主导倾向是尊重与合作：政府对大学独立保持相当的尊重；各大学诚意配合教育部颁发的大部分政策法规；大学借助教育部“权威”的象征更好地进行管理，或是利用象征性权威来维护自身权益；教育部有时有意维护学校权威、保障学校利益。

1912年至1937年间，各大学对于教育部的各项政策、法令也未必全是令出必行，有时是能拖则拖。教育部对于各项政策的执行情况、各大学的实际运作有时也情非得已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学开放女禁之前，教

育部对大学招收女生并未严加阻拦，这是有意不作为；民国时期各校校长向来由教育部委任，但也有例外现象，发生过由省长委派校长并掌校四年的事；国立大学的名实不符现象也时有存在，有些大学名为国立，政府及教育部却不能提供其教育经费，而有些大学名义上不是国立，事实上却在使用国款；教育部对于有关政策的实际执行并不坚持；大学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实施不力。另一方面，各大学对于教育部的有些政策并非不想配合，而实在是有心无力。比如限制教员兼任和各校添置设备问题；再如，大学进行军事教育问题，教育部对服装、授课时间、设备等均提出要求，各大学未必能执行；再比如，教育部对于教师薪酬有专门规程，各大学也未能切实遵办。此外，教育部与私立大学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管理松散到逐步加强的过程。

民国时期的大学对政府、教育部从来都不是俯首贴耳、惟命是从的，有尊重与合作，也有表面服从实则不作为。此外由于权力制衡以及经济利益的问题，二者之间时有抵制反抗与冲突，尤其是北京民国政府时期表现尤甚。主要表现有：抵制教育部对大学办学体制干涉的不当举措；部校之间在校长任命问题上的纷争；大学师生与教育部在学生运动问题上的较量。民国时期学潮不断，学潮爆发有其各种深层次的原因，反映到教育部与各大学之间的关系的表层来看，表现之一在于教育部对学生运动的阻止；大学师生对于有关教育总长的抵制等。北京民国政府时期，北大等校师生因不满政府任命的教育总长人选，多次发生反教育总长事件。大学对于教育经费的争取。教育经费问题是困扰民国时期尤其是北洋政府时期各大学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贯穿 20 世纪 20 年代的索薪运动和由此引发的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就是部校之间的典型纷争。

部校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既受到政府权威的影响，也受到中国社会文化传统中的“道高于势”与西方学术自由思想的结合后所产生的影响，更受到经济、军事等因素的影响。

在梳理史实的基础上，笔者认为，1912 年至 1937 年，教育部对于大学管理的组织机构建立方面，逐步走向健全，分工趋向合理；对于大学教育发展之政策与规划，能恪尽职守。但是对教育宗旨与教育方针，也即教育的基本方向，缺乏坚定的认识，摇摆不定，始终没有发生持续与积极的

领导作用；在建立大学教育制度方面，教育部见识不差，行动却过于缓慢；对于教育投资，民国时期的教育部初步建立了教育投资管理制度，但由于经费的匮乏，分配极不平衡，对大学的投资重点在国立大学，省立大学由各省负担，私立大学一般自筹经费。

1912年至1937年间，教育部与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的关系，从疏于管理、只规定大的原则走向逐步加强控制与管理。

最后，通过考察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部校关系，从中得出几点启示：中央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把握好高等教育的基本方向，坚定认识，千万不能摇摆不定。法令法规的推行、政策的执行必须注重稳定性和持续性。大学的发展需要国家的推动，更需要中央教育行政机关的支持、指导、协调与监督。教育经费是影响教育部与大学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的有效努力应与地方、私人的努力相结合。地方和私人的努力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可以补充国家有效努力的不足，与国家的努力相得益彰。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优良传统应该发扬光大。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们尤其倡导“大学自治、思想自由、学术中立”这样的大学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他们追求思想自由与教育独立的精神，历经岁月的积淀，越发地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此外，教育部从属与维护政府的立场和态度不会因人因事而改变。当政局动荡、经济匮乏之时，当新旧、官民、中外等矛盾冲突激化，危及统治秩序之际，教育部毕竟只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必然会牺牲教育规律以顺从“朝廷”旨意。

目 录

绪 论	(1)
一、选题的意义及问题的提出	(1)
二、研究现状	(4)
三、本文构想	(17)
第一章 民国教育部的沿革与组织机构	(21)
第一节 民国教育部沿革	(22)
第二节 民国教育部的机构设置	(36)
第二章 教育部对大学的管理职能和管理手段	(45)
第一节 高等教育立法概况	(45)
第二节 高等教育方针与政策	(52)
第三节 大学管理体制	(67)
第四节 课程与教材管理	(70)
第五节 教师管理	(80)
第六节 学生管理	(92)
第三章 部校关系的实际状况	(105)
第一节 尊重与合作	(105)
第二节 不作为与敷衍了事	(119)
第三节 抵制与冲突	(138)
第四章 部校关系状况的原因分析	(153)
第一节 政府权威的影响	(153)
第二节 “道高于势”与“学术自由”结合的影响	(158)
第三节 经济因素的影响	(161)
第四节 军事因素的影响	(168)

第五章 部校关系之启示	(170)
一、几点申论	(170)
二、启示	(174)
参考文献	(178)
附 录	(188)
后 记	(192)

绪 论

一、选题的意义及问题的提出

自近现代高等教育产生之日起,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就是一个无法回避、十分敏感,却无固定模式的问题,是一个古典的问题,更是一个常谈常新的问题。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也是当今高教体制改革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影响高校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关于政府与大学关系的真正系统的研究,西方一般认为始于19世纪初的洪堡时代。^①而在我国的高等教育领域,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随着扩大办学自主权的呼声的高涨,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成为人们广泛关注并加以研讨的一个热门话题,学者们已取得较多的研究成果。但是,民国政府与高校关系的研究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话题,尤其是民国时期,作为高校的直接最高行政管理机关的教育部^②与各类高校之间关系的研究,无论是史学出身还是教育学出身的研究者,鲜有人进行过系统爬梳、开展充分的研究。笔者所见到的绝大多数研究或着重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宏观研究,着重于教育宗旨与教育方针、学制与课程、师资与教学等;或着重于个体学校,着重于个体学校的历史变迁等等,而很少涉及教育行政部门与其领导下的学校群体的关系。

更令笔者感兴趣的是,后人一谈到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就不由得浮

① 龙献忠:《治理理论视野中的政府与大学关系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学位年度2005年,第13页。

② 民国时期政府最高教育行政管理机关经历了一个嬗变的过程,本文将有专章交待,在专章交待以外一般采取通称的说法。

想联翩，想到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竺可桢等大家，想到灿烂与辉煌、大家辈出、大师云集等字眼。确实，民国时期的不少高校无论是在人才培养还是学术研究上都成绩斐然，它们严谨的教风、优良的学风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但它们所处的历史大环境却极其恶劣，政权频繁更替、经济萧条落后、战乱频仍。我们都知道，高校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内外部环境。那么，民国时期为何会出现这一矛盾现象？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为何能取得较高的成就？这一现象的出现，难道仅仅是因为民国时期高校内部努力的结果？仅仅是因为近代知识分子们尤其是大学校长们是“制造新中国之良工”？^①仅仅是因为他们倡导大学自治、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结果？显然不是。历史本身是纷繁复杂的，历史的进程是参与历史事件的不同元素之间的“关系”的演变过程，一个事件往往是各种因素交缠萦绕、互相作用的结果。当时这些高校与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相当纷繁复杂，非常值得我们探讨、研究与借鉴，尤其是这些高校与它们的直接最高行政管理部门——教育部之间的真实关系状况到底如何，是简单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吗？教育部的各项教育方针、政策的实际贯彻情况到底如何？各类高校与教育部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是怎样的？

（一）笔者认为，考察探究1912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的部校关系，具有如下意义：

1. 尽可能翔实地展示1912年到1937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部校关系的历史真实，系统分析部校关系，并给予公允的评价与臧否。

2. 总结民国时期部校关系的有益的历史经验与可资借鉴之处，为当今的高等教育提供历史的参考。

3. 为大学与政府的复杂关系寻找一个历史的例证，以丰富大学与政府关系的理论。

（二）笔者认为考察探究民国时期教育部与大学关系需要回答如下问题：

1. 民国教育部对大学的管理，管了什么？亦即民国教育部对大学的

^①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见《陈旭麓文集》第1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5页。

管理职能有哪些？

2. 民国教育部对当时的公立、私立大学是如何管的？也就是说，民国教育部对大学的管理方式、管理手段是什么？管理过程是怎样的？

3. 民国时期大学是如何应对教育部的管理的？有哪些合作？有哪些抵制与冲突？又有哪些屈服与妥协？

4. 部校之间为何会呈现出那样的关系状况？

5. 部校之间的实际关系带来了什么影响？对于当今高等教育有何启示？

本文的研究时段起于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迄于 1937 年抗战爆发前。之所以选择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一是由于这一时期历经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部校关系的表象无太大区别，事实上则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最初十年间教育部对大学的管理与控制比北洋政府时期更强；二是由于资料搜集问题，更由于个人能力的原因。依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抗战爆发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这一时间段内，部校关系不易说得清。这也是笔者今后可以继续探研的方向。部分章节出于叙述的需要，时间有所上溯与下延。

本文所研究的“大学”界定为广义上的大学。1912 年 9 月 3 日教育部公布的《学校系统令》规定：大学本科三年或四年毕业，预科三年。高等师范学校本科三年毕业，预科专门学校本科三年或四年毕业，预科一年。1912 年 10 月 22 日教育部公布的《专门学校令》规定：专门学校之种类为法政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药学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美术专门学校、音乐专门学校、商船专门学校、外国语专门学校等。1912 年 10 月 24 日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1917 年 9 月 27 日教育部公布的《修正大学令》均规定：大学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其中《大学令》规定：文理二科并设者，文科兼法商二科者，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符合以上条件的可称为大学。《修正大学令》的规定较为宽松：设两科以上者，得称为大学；设一科者，称为某科大学。1922 年大总统公布《学校系统令》（壬戌学制）规定：大学校设数科或一科均可，其单设一科者，称某科大学校。大学校修业年限四年至六年，医科大学校及法科大学校修业年限至少五

年。师范大学校修业年限四年。1928年5月中华民国学校系统表及1932年学制系统图说明中规定：大学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商学院及医学院，具备三院以上者，且必须包含理学院或农工医各学院之一者，始得称为大学，不合上项条件者，为独立学院，得分两种。此项规定一直延续到民国末期。本文研究的大学基本上以上述规定为标准。

二、研究现状

（一）国内学者的已有研究

与本课题相关的已有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政府与大学关系的研究。龙献忠撰写的博士论文《治理理论视野中的政府与大学关系研究》，^①在其导论部分对政府与大学关系的研究现状做了全面回顾。指出高等教育界展开了关于办学自主权、大学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以及现代大学制度等问题的研究，也出现了直接探讨大学与政府关系的研究成果。总体来看，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大致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翻译和介绍欧美发达国家处理政府与大学关系所取得的经验，以此为改革我国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提供借鉴；二是对过去几十年来计划体制下政府对大学管得过多、统得过死，使大学丧失办学活力的现状进行批判和评价，并提出改革政府与大学关系的观点和建议。并且指出，关于大学与政府关系研究中的绝大部分研究多是以历史为线索、以政府或大学作为研究主体，从当前高等教育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以及政府与大学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角度来探讨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以此得出的结论常常是作为我们理解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基本结论，总是认为大学应该获得多少自主权。从研究视角方面来对有关政府与大学关系的文章进行分类，主要是围绕多视角来展开研究的。一是着眼于大学自身的视角，此类文章在明确理顺政府与大学关系的意义时，强调的是政府要根据大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通过大学自身的努力来实现这一目标。二是着眼于政府转变

^①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学位年度2005年。